

# 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理论特色

陈勇 闫月明

(信息工程大学 洛阳校区,河南 洛阳 471003)

**摘要:**俄罗斯的文化符号学植根于积淀深厚的莫斯科语言学传统和圣彼得堡文学传统,自1973年首次作为新的学科方向被正式提出以来,经过洛特曼、伊万诺夫、皮亚季戈尔斯基、托波罗夫、乌斯宾斯基等一大批享有国际声誉的俄罗斯学者的探索和拓展,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理论特色:一是融合索绪尔和皮尔斯两种符号学路线;二是推崇不同知识域结合和对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三是秉持基于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认识论立场;四是偏好以二元对立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五是关注不同文化符号对象的文本地位和符号域属性;六是发掘不同文化符号系统运作的同构性规律。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理论主张和研究实践对世界符号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俄罗斯;文化符号学;文本;符号域;结构主义;洛特曼;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

**中图分类号:**H0-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2)04-0013-10

## 0 引言

俄罗斯的符号学研究一方面继承了世界符号学发展的哲学、语言学和文学传统,表现出与之相应的跨学科特性和方法论本质,另一方面充满了对俄罗斯民族深层文化结构及历史发展背景的分析和思考。两个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得俄罗斯符号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文化符号学因此而成为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特色。(王铭玉等,2004:159)所谓文化符号学,即用符号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化事物、文化现象的学科。在文化符号学学者看来,一方面,“文化学首先是文化符号学”(Лотман,2002:13),符号学方法是文化学研究最根本的方法论(康澄,2006:1);另一方面,“符号学首先是文化符号学”(Лотман,2002:13),文化是符号学的首要研究对象。洛特曼(Ю. М. Лотман)认为:“文化学运用了符号的符号,创造了文本的文本。既然在文化中不存在符号外的构成物,那么解释任何文化现象都应该从符号开始,从解码开始。”(Лотман,2002:13)不管哪一种类型的文化,都是一种符号构成物,从符号的视角来认识、阐释、理解文化,有助于我们把握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本质特征。洛特曼之子、著名文化符号学家米哈伊尔·洛特曼(М. Ю. Лотман)甚至强调:“文化对于塔尔图-莫斯科符号学派不应说是主要的,而是唯一的研究对象。”(Лотман,2002:11)

文化符号学这一范畴由洛特曼与伊万诺夫(Вяч. Вс. Иванов)、皮亚季戈尔斯基(А. М. Пятигорский)、托波罗夫(В. Н. Топоров)、乌斯宾斯基(Б. А. Успенский)在1973年的全苏斯拉夫学大会上首次正式提出,会上学者们发表了《文化符号学研究纲要》这一纲领性的文化符号学论文。该论文从对文化的理解、文化的层级构造、文本的符号学基础地位、文化文本概念、文本重构、文化与记忆、文本

收稿日期:2022-03-16

作者简介:陈勇,男,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语言符号学与文化语言学研究。

闫月明,女,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博士生,主要从事语言符号学与认知语言学研究。

引用格式:陈勇,闫月明.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理论特色[J].外国语文,2022(4):13-22.

等值、文化系统层级间的关系、文化的运行机制等九个方面为文化符号学规划了蓝图(Лотман, 2000: 505-526)。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莫斯科语言学传统与圣彼得堡文学传统在爱沙尼亚城市塔尔图交汇融合的产物,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从不同的研究视阈探索了俄罗斯文化乃至斯拉夫文化的奥秘,构筑起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大厦,为世界符号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滋养和鲜活的思想源泉。梳理以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为代表的俄罗斯学者50年文化符号学研究的理论特色,为我们观察和理解俄罗斯文化提供了别样的路径。

## 1 融合索绪尔和皮尔斯两种符号学路线

符号学就对象而言大致表现出两种分野,一种倾向于对静态的、系统的意指现象进行分析,另一种倾向于对动态的信息传递和交际过程进行研究。艾柯(U. Eco)将这两种倾向分别称为意指符号学(сигнификативная семиотика)和交流符号学(коммуникативная семиотика)。穆南(G. Mounin)则分别称之为语义作用符号学和传达符号学,并认为两者在对象上存在对立:前者专以不存在代码的符号现象为对象,而后者只以背后有明确的代码的符号现象为对象;前者表现为符号功能—代码制作—解释,后者表现为符号—代码—解读。一般而言,人们倾向于将前者回溯到皮尔斯(C. S. S. Peirce),将后者归因于索绪尔(F. de Saussure)。符号学的这两种分野构成了符号学研究的两种路线——皮尔斯路线和索绪尔路线,两条路线实质是相互依存的关系,没有脱离意指关系的交流形式,也没有不指向交流的意指系统,所谓的区别只是侧重点不同。因而,在当代许多符号学家(如艾柯)的研究中,两条路线相互融合。

对于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来说,决定学派代表人物对待文化的符号学态度的首先是索绪尔和雅各布森(Р. О. Якобсон)的论著。索绪尔的理论决定着学派将文化整体作为符号空间来进行描写,而雅各布森对交际行为的定义奠定了洛特曼符号学空间信息交换学说的基础。事实上,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中的语言/言语、能指/所指、组合/聚合、共时/历时等二元对立术语在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研究者的著述中随处可见。应该看到,皮尔斯符号学路线对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影响尽管并不为学者们普遍关注,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企图将静态结构描述和动态文化演变结合起来,即把符号文本结构和文化史研究结合起来,其实体现的正是两条路线的融合。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旗帜性人物乌斯宾斯基认为,索绪尔和皮尔斯的符号学理论体系分别归属于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的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языка)和符号的符号学(семиотика знака),两者确定了符号学的两个主流方向:语言学方向和逻辑学方向。关于两者的区别,乌斯宾斯基认为:在前一种情况下,符号由参与交际过程决定,即作为这一过程的派生物而出现,在后一种情况下,符号被认为原则上与交际行为无关(Дёмин, 2017: 205-206)。换言之,在起源于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学路线语境下,符号是初始的和非退化现象,而在源于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传统中,语言被认为是初始的和非退化现象。事实上,乌斯宾斯基是在阐述对待历史的文化符号学态度时做上述区分的,他为此建立的符号学模式则融合了这两种路线。

在阐释历史进程性(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роцессуальность)的本体地位时,乌斯宾斯基秉持的是索绪尔符号学路线,他通过同自然语言交际过程的类比来理解历史进程,强调了历史的对话性本质:“历史进程可以作为社会与个人、社会与上帝、社会与命运等之间的交际出现;在所有这些场合中重要的是,相应的事件如何被认识,在社会意识系统中它们被赋予了何种意义。”(Успенский, 1996: 12)历史的符号学模式语境中的历史进程被视为基于某种语言的新句子(事件、文本)的生成以及它们被社会阅读的过程,阅读本

身也会催生新的文本、新的事件、新的历史情境等。在历史进程的符号学(或交际)模式框架中,语言(文化的语言)是历史和历史事件的生成机制,决定着对有意义事实的甄选,而符号概念在这种情况下是作为派生物出现的。对于阐释历史意识(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сознание)和构建历史描写和解释模式来说,乌斯宾斯基秉持的则是皮尔斯符号学路线。他认为构建历史意识的符号学模式依托的是逆向思维进程:从现在到过去。“历史意识在这个意义上必须以符号过程(семиозис)为前提……历史的符号学表征应该不仅基于语言的符号学,还应基于符号的符号学。”(Успенский, 1996: 15)在这种情况下处于第一性地位的是符号概念,语言被视为更为复杂更为衍生的现象。

历史认知的符号学模式在洛特曼的著述中也得到了总体性的勾画。在这个模式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对历史事实(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факт)的重新认识(Дёмин, 2017: 208-209)。洛特曼认为,与自然科学事实不同,历史事实应该在对文献资料的符号学诠释过程中确定。文化语境(符号学语境)不仅决定着某一事实的重要性及其在其他事实中的位置,而且决定着它的存在本身。洛特曼认为,区别于经验科学,历史学中的事实不是出发点,而是研究的结果。“历史学家首先面对的是充当解码者的角色。事实对于他而言不是出发点,而是艰苦努力的结果。他自己创建事实,渴望从文本中抽取文本外的现实,从关于事件的故事中抽取事件。”(Лотман, 1996: 301)可见,如果说洛特曼早期旨在对诗学文本进行结构主义分析的文学符号学研究采取的是典型的索绪尔符号学路线的话,那么洛特曼后期的历史符号学思想,尤其是构建历史认知的符号学模式时,采取的是侧重于重构代码的皮尔斯符号学路线。

## 2 推崇不同知识域结合和对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参与者头脑中知识怪异的结合模式。每一个参与者都具有关于源自遥远过去的某个具体言语领域的基本知识,如洛特曼之于过去时代的俄罗斯文学、乌斯宾斯基之于遥远古代的俄语、伊万诺夫之于赫梯语。熟悉这些按照别样的符号规律存在的言语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者们在研究初期结合现代世界探寻古代符号世界的困难。正因如此,洛特曼反对结构主义将语言等同于代码的观念,而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成分加入了历史因素。

事实上,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就是不同文化和子文化的冲突和交汇。这一背景鲜明地体现在各个学者的符号学探索和研究中:巴赫金(М. М. Бахтин)提出元语言学(металингвистика)概念,就是将符号学的起点定位于在元层次上作为统一模式代表的两种不同质对象的存在;从维果茨基(Л. С. Выготский)的研究来看,文化文本之所以成为符号学感兴趣的对象,是因为其中总是存在两种结构,因其而起的紧张和张力在宣泄中才得以缓和;阿萨菲耶夫(Б. В. Асафьев)谈到风俗和习俗以及语言、文学、诗学的变化乃至其他美学的出现时,将美学规范与伦理规范合为一体(Почепцов, 2001: 658);普洛普(В. Я. Пропп)和普姆皮扬斯基(Л. В. Пумпянский)强调文学交际中发生的扭曲世界的现象,认为文学交际不是现实的机械重复,实际上说的也是象征层级的对应关系和不同规范的交叉问题;乌斯宾斯基研究自己喜爱的历史对象时,借助符号学工具发现旧礼仪派教徒强调的是各种符号代码的不变性。由此可见,符号学的研究对象可归纳为以下三类:允许将不同种类对象联合起来的元层次;文化结构(代码)的冲突;作为结构自然冲突的文学文本。这种关注符号系统之间的融合与冲突的符号学研究氛围为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王铭玉等, 2021: 350)。

作为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领军人物,洛特曼广泛涉猎各种符号系统,在语言中心论思想、符号域思想、文学符号学、文化符号学、交际符号学、行为符号学、电影符号学等不同领域进行了不懈探索,留



下了丰富的理论思想。洛特曼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正在于他能够轻松地从一个符号系统转向另一种符号系统,而这种轻松转换的基础则是严肃的有充分根据的深入研究,这使得洛特曼的研究对象包括文学语言、电影语言、行为语言、绘画语言、戏剧语言等非常多样化的符号系统。(陈勇,2015:31-41)洛特曼的文化符号学研究堪称践行不同知识域结合和对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的典范。比如洛特曼从语言学角度对俄罗斯11—19世纪的文化类型进行了分类。洛特曼认为,人类的文化是建立在自然语言这一符号系统基础上的,因此,对待语言符号的态度就决定了对文化代码的分类,也就是说,语言符号系统对文化代码的类型有着“模式化的影响”(赵爱国,2021:601)。在深入分析俄罗斯文化演变和发展的历程后,洛特曼将自基辅罗斯至19世纪中叶俄罗斯经典时期的文化分为了四种基本发展阶段:文化代码仅作为语义组织的阶段;文化代码仅作为句法组织的阶段;文化代码追求否定语义和句法组织(即否定符号性)的阶段;文化代码作为语义和句法组织综合的阶段。这四个发展阶段分别彰显出语义、句法、无语义无句法、语义-句法等四种文化代码类型。

伊万诺夫的著述提供了最包罗万象的符号学全景,包括了所有类型的符号学。其研究的一个典型特点是最大程度的跨学科性,从印欧语语言学到生物学、精神病学、控制论、人类学、电影学,这使得他的符号学学说很具包容性。伊万诺夫也考察了戏剧和电影符号学问题:通过戏剧分析,伊万诺夫得出了关于文化一般性问题的结论,如中世纪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空间的垂直性”既体现在世界之树等主要象征符号的垂直性上,也体现在中世纪神秘剧舞台天堂、地面和地狱三级形式划分上;基于“对语言结构最清晰的认识源于与其他语言的对比”这一观念,伊万诺夫考察了电影小说的出现、电影语言中的时间范畴、经典暴力影片框架中标准的组合式情节模式等。托波罗夫从符号学角度探讨城市文化尤其是彼得堡文化,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城市符号学思想,论证了彼得堡符号的典型特征:1)二元对立性,从俄罗斯符号学传统特有的二元对立视角对彼得堡名流贤达、人文景观、社会意识、思想形态、体态形象以及灵魂心智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深入解构;2)神话性,强调相较于莫斯科的具体性、实在性、自然性彼得堡所具有的抽象性、虚幻性、神话性;3)文本性,体现的是不同时代作家的文本如何塑造彼得堡形象、书写彼得堡故事。托波罗夫认为,某种综合性的彼得堡超文本(сверхтекст)与彼得堡相吻合,与这一超文本相联系的是最高意义(Топоров,1993:211)。除此之外,加斯帕罗夫(Б. М. Гаспаров)的音乐符号学思想和乌斯宾斯基的圣像符号学理论体现的都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

### 3 秉持基于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认识论立场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视野下的文化符号学同时也是文化的信息模式,因而学者们的著述中常常谈到信息的传播问题,这也体现了学派倾向于借用自然科学领域的观点、方法、理念来开展研究的鲜明特点。洛特曼在《文学文本的结构》一书中就是从信息论角度来理解符号学的:“信息论在引申意义上即符号学,它不仅研究在一定集体中运用社会符号这类特殊情况,而且研究信息传播和存储的一切情况,因此信息可被理解作相对于熵的组织性的度量。”(李幼蒸,1999:590)洛特曼认为,文化是人的社会存在条件,它既表现为符号系统或结构,也表现为信息传递系统。

事实上,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形成本身就是控制论、信息论等当代科学理论影响下的产物。正是在当代科学思想的影响下,伊万诺夫、列夫津(И. И. Ревзин)和乌斯宾斯基于20世纪50年代中叶文化

解冻初期创建了机器翻译协会,提出了一般符号通讯论,并于1960年<sup>①</sup>创立了科学院斯拉夫语结构类型学研究室,成为人文科学符号研究的一个中心。此外,1956—1958年伊万诺夫、列夫津和乌斯宾斯基等学者同库兹涅佐夫(П. С. Кузнецов)一道组织了数理语言学讲习班,伊万诺夫和托波罗夫1962年倡导在莫斯科召开了对于学派形成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符号系统结构研究专题研讨会,该研讨会正是由科学院斯拉夫语研究所和控制论委员会联合举办的。同样是在20世纪50年代,洛特曼受到什科洛夫斯基(В. Б. Шкловский)等形式主义理论家观点的影响,将机械论和信息论的相互关系纳入对文学交际的理解之中。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的控制论、结构主义、机器翻译、人工智能、文化描写中的二元对立等一系列新的思想迫使洛特曼反思先前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指导下的文学研究。在洛特曼与明茨(З. Г. Минц)、叶戈罗夫(Б. Ф. Егоров)的共同努力下,由他当教研室主任的塔尔图大学俄罗斯文学教研室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学者,并成为符号学的另一个研究中心。可见,两个符号学中心的出现都与控制论和信息论有着密切的联系。

根据文化历史的信息论-符号学思想,系统中的动因、基本的进展与符号现象间的对话是相关联的,而这种对话发生在它们的区别得以现实化时。洛特曼认为不同文化对象区别的起因在于左右不对称,这种不对称是从遗传分子层次到最复杂的信息过程的对话基础,是所有意义生成过程的基础。揭示文化演变的符号学机制时,洛特曼渴望从一般现代科学知识的立场——用一般系统论、信息论、通讯理论、热力学、生物学、医学的术语——研判这些机制。由此,他将文化定义为“生产信息的装置”,就像生物圈借助太阳能将非有机体加工成有机体一样,文化依靠周围世界的资源将非信息变为信息。文化是人类的反熵机制(Лотман,1992:9)。作为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伊万诺夫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特别关注自然科学发现的普遍规律,原因在于:一方面,自然科学有助于解决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人文科学框架内客体化程度的提高促使学者们向自然科学问题和方法靠近。在这个意义上,伊万诺夫进入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元层次,比如他写到了记忆在人类文明框架中的角色以及前文字社会中传播知识的可能性问题等。事实上,伊万诺夫提出的信息符号学思想鲜明地体现出控制论、信息论等科学理论的影响。伊万诺夫基于现代科学研究和他本人对失语症的研究,认为人类的行为实际上受到人脑左、右两个半球的控制,从符号学角度看,左脑负责词语的发音即能指部分,而右脑储存的主要是语言符号的意义即所指信息,由此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控制论模式——左脑语法模式和右脑语义模式:左脑利用储存的语法信息来操纵词语,并采用各种方法对词语进行组合;右脑基于对现实时空真值的感知,检验左脑所获词语组合,经过检验是理性的和真值的,方可获得相应的语义信息。(赵爱国,2021:646)在此基础上,伊万诺夫从控制论模式出发来审视人类文化和语言中仪式、神话等不同代码的意义,从研究人脑的异同功能(左右脑的对话)拓展到“人-机对话”和“人-人对话”领域,从而深刻揭示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统一性问题,并提出了生物学的大量新发现使人类知识(包括人文知识)具有了上述统一性的重要结论(赵爱国,2021:650)。

#### 4 偏好以二元对立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方法论

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时代被普遍接受和运用的一种逻辑分析原则。语言学结构的二元对立机制和

①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在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设立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室并在各大学设立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业的决议也是在这一年通过的,这一决议的通过与一些结构主义学者被邀请参与机器翻译有一定的间接联系。因此,托波罗夫将1960年称为结构主义“合法化和被承认之年”。

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结构二极系统观均源于人类大脑中普遍的二极制。(李幼蒸,1999:592)索绪尔将二项对立的方法带入结构主义语言学而做出的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组合和聚合、共时和历时等多项二元区分构成了符号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工具,开创了将二元对立观作为普遍的逻辑分析原则的结构主义时代,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从文学文本走向俄罗斯文化史、文化思想史、意识形态的研究时,洛特曼偏爱二元分类法,这明显是受到了雅各布森及列维-斯特劳斯(C. Levi-Strauss)结构主义二分法的影响。事实上,洛特曼在其传统的文学分析中及后来对诗歌进行结构分析时就一直沿用意义对立分析法,在考察俄国历史和思想史时发掘出了一些突出的二元对立观念:俄国与西方、基督教与异教、真信仰与假信仰、知识与无知、社会上层与社会底层等。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和洛特曼极具理论特色与世界影响的文化类型学研究也处处体现出二元对立的效力,除了有关第一性模式化系统和第二性模式化系统的划分外,他们还做出了多种二元划分。比如,洛特曼将文化文本分为聚合类型和组合类型两种内部组织类型:对于聚合类型而言,世界图像被看作时间外的聚合体,其中诸成分分属不同层次,代表不变意义的种种变体;对于组合类型而言,世界图像被看作一个序列,其中诸成分存在于一个层次和单一时间平面上,并在彼此相互关联中获取意义。洛特曼认为,文化按其组织二极系统的方式而呈现出不同的方向,文化类型可区分为语法方向的文化和本文方向的文化。两类文化组织代码的方式不同,前者由规则系统支配,后者由制导行为模式的文本所支配。换言之,语法方向的文化重内容面,文本由离散单元的组合产生,并按其与组合规则相符与否而判断其正误;文本方向的文化重表达面,社会可直接产生文本(李幼蒸,1999:599)。按照文本结构和功能理论,洛特曼将人类文化分为闭文化和开文化两大类:闭文化中,传统呈持续的稳定态,表现为大量的真理系统和一个完善的文本;开文化中,开始时无传统的积累,一切从零开始,真理被逐渐创生和积累,其丰富性有待于未来。学派还提出了另一个有趣的分类,即将文化类型区分为偏于文本方向和偏于功能方向:前者企图建立专门化文本,以使每一不同文本对应于每一文化功能;后者企图消除文本之间的区别,以使统一的诸文本能执行整个系列的文化功能。与此同时,按照概念指向性不同,学派将文化分为主要指向表达面的文化和主要指向内容面的文化,并分别通过一系列对立概念来描述这两种文化,对前者的描述借助正确的/不正确的、篇章系统/规则系统、真实的/虚假的、象征/仪式等对立概念,对后者的描述则借助秩序化的/非秩序化的、文化/自然等对立概念。

伊万诺夫认为,世界万物都具有双重性或者说对立性(赵爱国,2021:644),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关于意识和文化历史中对生符号(парные символы)普适意义的思想。伊万诺夫指出,一方面,人类最早关于二元对立的普适性观念植根于人的生物学本质(男性本原和女性本原的对立,大脑功能的不对称);另一方面,二元性反映了古时将部落划分为两个只有相互之间可以通婚的外婚部族的传统(而作为乱伦禁令,同一部族的成员之间严禁通婚)。根据伊万诺夫的假说,人类符号系统的非对称构成,包括男性的/女性的、右边的/左边的、奇数/偶数、上/下等偶对事物内部的各种评价(前者被评价为“好的”,后者被评价为“不好的”),取决于大脑功能的不对称性:“带有情感的对立构成的双极系统‘内置到’头脑本身的构造中”。(Иванов,1978:107)。乌斯宾斯基基于二元对立提出了文化二元论思想,认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进程是按照“新与旧”或“文化与反文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建构起来的。具体到中世纪文化,古罗斯文化将地理空间视为价值范畴,据此可将某一地域评价为“纯洁之地”与“非纯洁之地”“正义之地”与“罪恶之地”,认为这种完全对立的二元论道德范畴在古罗斯文化中体现得尤为清晰(赵爱国,2021:615)。

俄罗斯符号学家格外青睐这种二元对立的符号学运作机制,这与由索绪尔开创的二分法原则相联



系,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俄罗斯文化的两极性(биполярность)<sup>①</sup>、两中心性(двучетровость)及俄罗斯民族个性的极性倾向(поляризация души)。

## 5 关注不同文化符号对象的文本地位和符号域属性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将人类活动的任何表现都解释为文本(текст),文本是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理论思想的核心概念,面向文本因而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的典型特色。洛特曼强调文本是一个有组织的符号系统,是文化最起码的组成部分和基础单位,是具有离散性和层次性的结构,存在于自然语言、人工语言系统和文化结构系统中。洛特曼同时特别强调文本的三种功能:1)交际功能,即传递和理解信息的功能;2)创造功能,即创造新表述和新意义的功能;3)记忆功能,文本是文化记忆的冷凝器,具有保存对之前语境的记忆的能力。

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在方法论发展的早期阶段,强调交际行为中代码(语言)的第一性特征和文本概念的第二性特征。运用文本理论,洛特曼对大量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进行了文本符号学分析,提出了丰富的文本符号学思想。洛特曼认为,研究艺术文本时要兼顾文本的思想结构和审美表象结构(语言表现艺术结构),把文本的形式结构和思想内容联系起来;艺术文本的结构是信息意义的决定因素,艺术结构既是形式的,又是内容的,艺术文本是高度浓缩的信息机制(Лотман,1998:271-281)。基于对艺术文本的这些认识,洛特曼从符号学的基本原理出发,由微观到宏观对诗歌文本的重叠、节律、韵脚、线条形象、排偶、诗段、情节、文本、系统等逐一进行了语言学分析,为20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文本(篇章)研究热潮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范例(赵爱国,2008:2)。对文学艺术文本的研究促使学派代表人物认为,文学文本不仅仅只是信息的包装(Гришанин,2007:10)。文学文本与不同代码接触,能够被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解码,成为新文本的生成器,这直接导致洛特曼及其学术上的志同道合者提出了文化即文本的观念(культура как текст)。以此为基础,学者们认为采用分析文学文本的方法来分析文化是可行的,进而对文化符号对象进行了广泛的系统研究。

在不断拓展文本符号学研究的过程中,洛特曼在1984年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符号域概念(семиосфера),即交际过程得以实现和新信息得以生产的空间。洛特曼认为,任何单个语言都浸入某个符号空间,只有在与该空间的相互作用中才能发挥作用。被认为是不可分解的工作机制(符号过程单位)的不是单个语言,而是为该文化所固有的整个符号空间,洛特曼将此空间称为符号域(Лотман,2000:252)。在洛特曼看来,离开了符号域则不会有交际也不会有语言。符号域构成了智慧圈(ноосфера)<sup>②</sup>的交际-符号结构。如果说智慧圈包括意识的内容及其对现实的影响,那么符号域是意识的符号支撑系统,即意义的载体和传递者、信息传递的渠道和方式(Мечковская,2007:81)。符号域的本质特征在于:其一,符号域区隔于外符号空间或异符号空间(非符号空间事实上可能是另一种符号学空间),包括众多具有自己的内部和外部边界、相对独立的符号领域。其二,符号域具有层次性的(层级性的)和内部不均衡

① 在对比斯拉夫文化和西方文化之后,洛特曼认为,斯拉夫文化是一种二元系统(бинарные системы),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三元系统(тернарные системы),三元系统中的爆发不会消灭所有现存的东西,而会保留某些珍品并将其从边缘位置移至系统的中心,而二元系统中的爆发会涉及一切。

② Ноосфера一词源自希腊语 nous(智慧;理智),指由人的意识组织而成的生命领域,由法国哲学家洛伊(E. L. Roy/ Э. Л. Руа,1870—1954)于1927年最先提出。“智慧圈”概念源自“生物圈”(биосфера)概念,后者最早由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J. -B. de Lamarck/ Ж. Б. Ламарк,1744—1829)1802年在《水文地质学》一书中提出。俄罗斯著名地球化学家韦尔纳茨基(В. И. Вернадский,1863—1945)在1926年出版的《生物圈》一书中对“生物圈”这一概念进行了拓展,而在听过洛伊的演讲之后,韦尔纳茨基非常赞同洛伊提出的“智慧圈”这一术语,认为洛伊发展了他关于生物圈的学说,韦尔纳茨基基本人则在20世纪40年代进一步发展了“智慧圈”这一概念。

的组织 and 动力(核心和边缘、均衡与非均衡、新生事物和旧生事物等)。其三,信息的生成过程和符号过程只有在各种符号构成物(即各种语言构成物)相互作用和对话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而对话发生在边界,因为边界的本质是二语的。其四,符号域具有历时深度,因为它具有复杂的记忆系统,而没有记忆则无法运行。对于符号域而言,“边界”(граница)概念尤为重要。所谓边界,就是按照拓扑学理论划分出来的符号域中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之间的界限。洛特曼认为:“任何文化都始于将世界划分成内部空间(自己的)和外部空间(他们的)。这种二元划分如何阐释,这取决于文化的类型。然而,这种划分本身却属于共相。边界能够将活着的与死去的、定居的与游牧的、城市与草原划分开,具有国家的、社会的、民族的、宗教的或者其他的特征。”(Лотман, 1996:174)洛特曼认为,符号域中处于边界、与中心相对的边缘,作为规范得以弱化的地方,成为系统未来动态发展的中心。

## 6 发掘不同文化符号系统运作的同构性规律

苏联哲学家韦特罗夫(А. А. Ветров)曾指出:“符号学作为符号和语言的一般理论,是一门涉及很广的科学……对比相距甚远的领域使得符号学不仅能推导出某些一般的规律,而且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这些领域不对其进行对比就无法把握的特点。”(Ермоленко и др., 1992:195)在斯捷潘诺夫(Ю. С. Степанов)看来,这些作为常体的一般规律正是作为整体的符号学最终需要努力揭示的问题,这里涉及的其实是不同符号域的同构性问题。这一问题在索绪尔时代就已显现,艾柯就曾指出:“早在索绪尔时期,语言已成为一切符号系统的模型,其他符号学系统均可转译为语言的内容面。”(李幼蒸,1999:597)列维-斯特劳斯更是从人类学的角度确认了这种同构性特征的存在,他认为,既然语言是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那么,它“就同时构成文化现象(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的原型,以及全部社会生活形式借以确立和固定的现象的原型”(霍克斯,1987:25)。由此出发,列维-斯特劳斯致力于将语言学的方法运用于亲属关系、神话和野蛮人的思维等各种文化现象的分析中。

对于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来说,语言符号与非语言符号间的同构关系以第一性模式化系统(Первичные моделирующие системы)和第二性模式化系统(Вторичные моделирующие системы)的形式和名称固定下来。语言被理解为第一性符号(生成的和模式化的),而其他的都被理解为第二性的,因为它们内容上依赖于语言,在语言参与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并在语言的帮助下得以阐释(Мечковская, 2007:77-78)。第二性模式化系统相对于作为第一性模式化系统的自然语言而言是第二性的,是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直接(文学的超语言系统)或者以与之平行的形式(音乐或写生画)添建的(Лотман, 2000:521)。学派在30年的存续期间善于考察最不相同的符号系统和文本,强调符号学应该关注符号系统的共存和接触现象,强调采取统一的视角来看待不同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挥功用的文化-历史背景(Иванов, 1999:700)。其结果之一是,学者们很自然地将在第一性模式化系统研究(即语言学)中得到检验的方法移用到非语言学对象中,比如,“语法”(грамматика)这样的术语广泛用于非语言语境中。其结果之二是,从一种符号语言转译成另一种符号语言成为产生新知的重要源泉。这种转码的过程不仅仅能产生新的意义,而且还能确定独特的文本阐释样式。洛特曼对十二月党人日常行为的分析视角就是理解 and 行为模式从一个符号系统向另一个符号系统的迁移(陈勇,2017:46)。学派强调自然语言系统对于非自然语言文化符号系统的影响,致力于寻找第一性模式化系统和第二性模式化系统的共性特征。其中的一般性原因可理解为,自然语言作为更强势的符号系统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艺术语言等更弱势的系统。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学派将文化视为集体的非遗传记忆这一基本观念,甚至是在同过去状态彻底割裂的



状态下构建的文化阶段也带有源自过去的清晰印记。

乌斯宾斯基的著作《结构的诗学》是莫斯科-塔尔图符号学派第一次对大型文学形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进行经典符号学分析的尝试。该著的中心范畴是“视点”(точка зрения)(西方语言学界称之为“移情”(эмпатия)),视点被乌斯宾斯基解释为文学作品、造型艺术、电影、戏剧等不同类别艺术的结构的主要问题。文学文本由若干个视点(亦即叙事展开的若干立场)组织而成,视点之间的区别决定了时空层面、意识形态层面(评价的选择)、成语层面(语言手段的选择)和心理层面。视点在造型艺术中是前景问题,而在电影中是作为剪辑问题凸显出来的。在这部书的最后,乌斯宾斯基指出了文学和造型艺术一系列共同的内容表征原则,比如文学叙事和造型艺术作品中内部视点和外部视点的区分、框架问题(即现实世界和刻画世界之间的边界问题)、普通符号学意义上文学文本中作品的“终端”和“开端”问题等。

## 7 结语

综览俄罗斯的文化符号学研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典型特色在于:一是融合索绪尔和皮尔斯两种符号学路线;二是推崇不同知识域结合和对照的跨学科研究范式;三是秉持基于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认识论立场;四是偏好以二元对立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方法论;五是关注不同文化符号对象的文本地位和符号域属性;六是发掘不同文化符号系统运作的同构性规律。当然,对俄罗斯符号学的发展持悲观态度者也有之,如俄罗斯语言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日沃夫(В. М. Живов)曾悲伤地指出,苏联的符号学流派在1980年代中期就已经彻底解体,“尽管它的一些成员继续感受着对于某种思想统一体的归属感,并抱怨那些脱离该统一体的人,但统一体本身原本并不是共同的方向和研究上相互作用的空间,而是共同的记忆,向各个方向走散的学者对于驻留在过去的精神上的世外桃源的记忆”(Марков, 2020: 47)。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俄罗斯文化符号学研究重视自身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深入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核的倾向有效地整合了各个符号域的研究,为各人文学科间的对话交流和有机融合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对于新文科背景下我国符号学研究乃至人文学科的跨学科整合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 参考文献:

- Дёмин И. В. 2017. Семиотика истории и герменев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 [М]. Самара: Самар. гуманитар. акад.
- Гришанин Н. В. 2007. Текст, символ, миф в семиотическом анализе город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Д]. Автореферат диссертации на соискание ученой степени кандидата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и. СПб: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
- Ермоленко С. С. и др. 1992.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нов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в мировом языкознании [М]. Киев: Наукова думка.
- Марков А. В. 2020. Семиотика культуры В. М. Живова: социальная дискуссия в Аркадии [J]. Вестник МГУКИ (2): 44-52.
-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1978. Чёт и нечет: Асимметрия мозга и знаковых систем [М]. М.: Сов. радио.
- Иванов Вяч. Вс. 1999.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 семиотике и истории культуры [М].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Лотман Ю. М. 1992. Избранные статьи: В 3 т. Т. 1: Статьи по семиотике и тип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ы [М]. Таллинн: Александра.
- Лотман Ю. М. 1996. Внутри мыслящих миров. Человек-текст-семиосфера-история [М].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Лотман Ю. М. 1998. Об искусстве[М].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Лотман Ю. М. 2000. Семиосфера[М].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Лотман Ю. М. 2002. История и типология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М]. СПб: Искусство-СПб.
- Мечковская Н. Б. 2007. Семиотика. Язык. Природа. Культура[М]. М.: Академия.
- Почепцов Г. Г. 2001. Русская семиотика: идеи и методы, персоналии, история[М]. М.: Рефл-бук/Киев: Ваклер.
- Топоров В. Н. 1993. Петербург и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текст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 Морева Л. М. Метафизика Петербурга. Вып. 1. СПб: Эйдос: 205-235.
- Успенский Б. А. 1996.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Т. 1: Семиотика истории. Семиотика культуры [М]. М.: Язык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 陈勇. 2015. 俄罗斯符号学家洛特曼思想综论[J]. 语言学研究(第18辑):31-41.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 陈勇. 2017. 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研究综览[J]. 外语教学(2):44-49.
- 霍克斯. 1987. 结构主义和符号学[М].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康澄. 2006. 文化及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洛特曼文化符号学理论研究[М].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
- 李幼蒸. 1999. 理论符号学导论[М].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铭玉, 陈勇. 2004. 俄罗斯符号学研究的历史流变[J]. 当代语言学(4):159-168.
- 王铭玉, 张智庭, 孟华. 2021. 符号学思想论[М].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赵爱国. 2008. 洛特曼“四维一体”符号学理论思想论略[J]. 外语与外语教学(10):1-7.
- 赵爱国. 2021. 俄罗斯符号学研究范式的百年流变[М].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Semiotics

CHEN Yong YAN Yueming

**Abstract:** Russian cultural semiotics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profound Moscow linguistic tradition and St. Petersburg literary tradition. Since it was formally proposed as a new discipline for the first time in 1973, Russian cultural semiotics has gradually formed distinctiv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a large group of influential Russian scholars' active exploration and expansion, such as Y. M. Lotman, V. V. Ivanov, A. M. Piatigorsky, V. N. Toporov and B. A. Uspensky. The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n cultural semiotics include six aspects: firstly, it theoretically integrates Saussurean semiotics with Peircean semiotics; secondly, it adop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attern combining and comparing different knowledge domains; thirdly, it holds the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 based on cybernetics and information theory; fourthly, it prefers structuralist methodology represented by the binary opposition; fifthly, it focuses on the textual status and semiotic domain attributes of different cultural symbols; sixthly, it explores the homogeneity of the operation of different cultural symbol systems. The theoretical claims and research practices of Russian cultural semiotics hav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evolution of humanities in the world.

**Key words:** Russia; cultural semiotics; text; semiotic domain; Structuralism; lotman; Tartu-Moscow Semiotic School; Lotman

责任编辑:肖谊